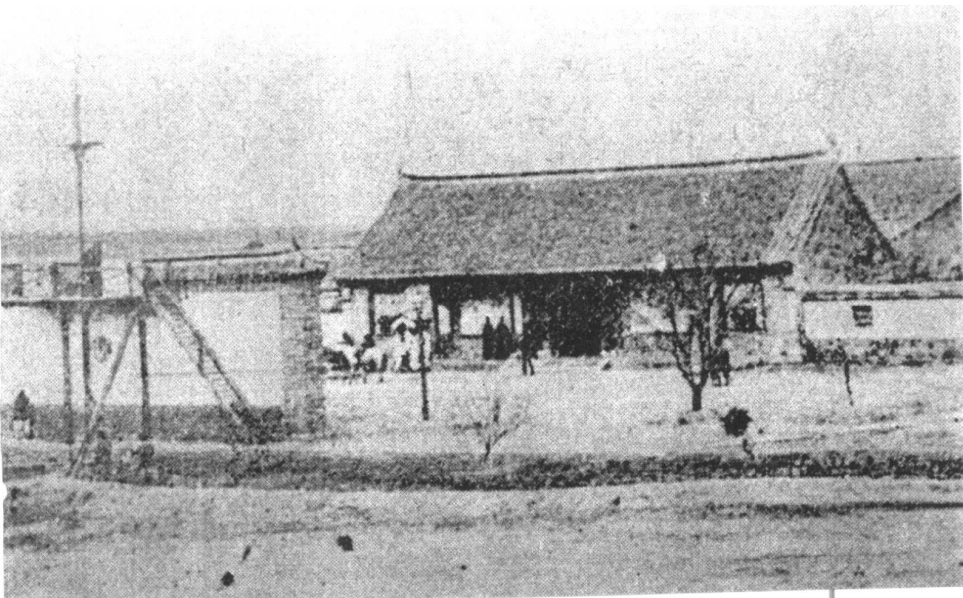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胶澳风云



李希霍芬的第三次中国之旅

李希霍芬沉浸在亚洲研究热里，渴慕“开始对中国进行独立研究的时代”——随同普鲁士外交使团的东方之行——南线受阻，北线也未能“出镜”，把他逼上孤独之旅——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从加利福尼亚重新开始——在“并不熟悉路径的跛足向导”的陪伴下游历大半个中国——奥古斯特·彼得曼的发现，给《地理学报告》带来一个火爆的夏季——从《中国》第 1 卷到《中国地图册》青岛在西方文献中初绽一笑——博山印象——一条虚拟的山东铁路和一座未来自由港的诞生——声噪一时的“胶州赞歌”，使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终有定论

斐迪南·封·李希霍芬决定开始他的第三次中国之旅，从他上一次中国之行模拟路线的起点——加利福尼亚开始。

这个决定，对于他——一个奥地利地质学家只身闯入一个拥有 18 个行省的巨人般的陌生国度，尝试用孱弱的足迹亲历那个令西方社会望而却步的、神秘迷人的东方之梦，乃至后来成为一位出色的东方学家和近代地貌学之父，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以前的一切，由此而逆转，以后的一切，由此而发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推动他的事业之船飞流直下，一往无前。

19 世纪中叶，欧洲工业革命走完了 70 年的漫长路程。英国在驰入“铁路时代”之后，又乘“慧星号”轮船，完成横渡大西洋

的航行。从此，遍插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成了横行无忌的世界漫游者。这意味着，靠发现新大陆来扩张领土的“哥伦布时代”已经过去，而倚仗坚船利炮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角逐已然登场。此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土地依然在无休止的战乱中颤栗，但在柏林攻读地质学的李希霍芬却完全置身世外，沉浸在一种狂放的亚洲研究热里。这股研究热风靡大学校园，打开了莘莘学子的渴慕之心当时，掀动亚洲研究热的两位中心人物——亚历山大·封·洪堡和卡尔·里特尔已年届生命的后期，但洪堡在结束亚洲考察后于1829年出版的《亚洲中心》和卡尔·里特尔介绍亚洲的鸿篇巨著《普通地理学》的影响却强烈而持久，它激荡的涟漪一直弥漫在柏林的学术圈里。垂暮晚照中，这两座人所共仰的学术峰巅，开始注目中国的研究，产生了考察中国的设想和计划，但耄耋之年他们已经没有力量踏上这片遥远的国土了，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后来人。这时，年青的李希霍芬闯进了柏林学术圈，很快成为亚洲研究中心的后起之秀，他暗自发誓，沿着巨人的肩膀攀登，“开始对中国进行独立研究的时代”。

彼得·谢苗诺夫推动他向自己的目标走近了一步。彼得·谢苗诺夫是一位俄国地质探险家，是俄罗斯亚洲研究的奠基人，曾经孤身深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对整个北亚地区做过多年地质考察。从结识彼得·谢苗诺夫起，李希霍芬的亚洲登陆点锁定在西伯利亚。但意外的是，当他把经北亚进入中国的计划和盘托出时，却首先遭到彼得·谢苗诺夫的反反对。

从危机中窥见机会，往往凭借政治家的一双锐眼。及时提醒帝国内阁，从普鲁士邦国纷乱不已的政治纠葛中腾出手来，去向东方的“丝绸之国”订立一纸签约，不能不说是商工大臣奥古斯托·海特男爵的深谋远虑。帝国内阁接受了海特男爵的提议。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显示实力和扩展空间的需要”，普鲁士决定

向中国派出一个使团 1859 年，被认为是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时刻，四艘普鲁士船舰在弗里德里希·温·尤伦伯格伯爵的率领下驶往中国。这个普鲁士使团庞大而奇特，尤伦伯格伯爵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还有商会全权代表、银行家、建筑工程师和传教士，由于使团肩负的特殊使命，这支远征舰队还配备了一批年轻的海军士官。这个打算用炮舰和清王朝讨价还价的高级别外交使团，混合了帝国赋予的各种使命。除了强订条约之外，还包括效仿英国的成例在中国得到一块如同香港那样的海军锚地和商业巨埠，当时帝国海军把选址的目标定在台湾，于是，李希霍芬作为参与选址的地理学家，进入使团行列。

漫长的海上旅途和供人驱遣的角色安排都不使他厌倦。他把观察镜支在甲板上，极目搜寻船舷两侧的陆地和起伏绵延的远山。舰队每一次靠岸补充给养，他的发现都在甲板上唤起阵阵欢呼的声浪……终于，舰队的帆影浮出东海海面，旖旎的江南水乡撞入异国人的蓝瞳，但尤伦伯格却被电报告知，英法两国代表正在北京同中国进行谈判，作为一支首访的异国舰队置身其间，将被视为不速之客。于是，尤伦伯格只好率使团折往日本。在那里，尤伦伯格如愿以偿地签定了一个商业条约。1861 年 3 月，这支舰队终于到达天津，和中国正式签约的时间，是在半年之后。条约缔结以后，李希霍芬偕另一位地矿专家考察了台湾。当时正是台湾海峡飓风登陆的季节，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冷雨霏霏，连日不开，李希霍芬趁风定浪息的间隙紧张踏勘，在阴霾的笼罩下，发现了这座宝岛那自然天成的罕世之美和令人惊羨的富饶，他在写给内阁的考察报告中称赞备至，对海军的选址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数据和理论分析。当然，如果李希霍芬的报告被采纳的话，台湾的历史将由此而改写。但尤伦伯格的看法恰恰相反，岛上的季风留给伯爵的印象太糟，他说环岛之内，找不到一块避风的地方，舰

队一直到拔锚启航，都看不到所谓良港在哪里，他更相信条约的作用，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条约所定的特权能付诸实施的话，德国定会在华取得一块基地”。

尤伦伯格的刚愎自用，深深刺伤了李希霍芬的自尊，他不相信有条约就有一切，对于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一个匍匐在“天之子”脚下的神秘版图，仅仅一纸条约能解读他那一连串的神秘符号和逻辑语言吗？

1862年，李希霍芬退出普鲁士使团。就在这一年，他设计出由南亚进入中国的考察路线。但命运之神却未肯眷顾他。

加利福尼亚海岸一点一点地从燃烧的天幕中显现，湿漉漉的海风亲吻他的脸颊。他对着喷薄的日出凝望良久，移步走向海滩，他觉得松软的海滩不像踩在岩石上那么踏实。当他决定沿着中国之路的路子再从头走过，他对自己的决定隐隐感到一种莫名的惊恐——这毕竟不是在双鹫旗的荫庇之下跟随阵容庞大的外交使团出访，而是一个人进行的一次意义非凡的中国之旅啊！尽管中国之旅注定将成为他仰望的事业巅峰，冥冥中有一缕破晓的微熹在颠尖闪耀，但李希霍芬仍然感到自己的决定有些唐突、莽撞，“我忐忑不安地站在这个神秘国家的大门口，一个人对其进行考察看来是次鲁莽的行动”，10年之后，李希霍芬出版他的5卷本巨著《中国，独自旅行基于其研究的成果》第一卷时，这样描述他当年那种难以自拔的心情。

失败乃成功之母，但你得有足够的力量承受失败给你带来的厄运，催促自己从困厄中昂首前行。李希霍芬退出普鲁士使团的举动，无疑是件“出格”的事情，不少人从他身上似乎嗅出一股很“异类”的味道。使团的成员是“钦定”的，在使团解散之前，任何人中途退出都将被视为对使团神圣使命的亵渎。李希霍芬不

在乎这些，他专心致志地准备着自己的行囊。摆脱了俗务的纠缠和尤伦伯格那副气指颐使的面孔，他感到一身轻松，奔涌的思绪又回到中国之旅的筹划上。迈出独身亲历的第一步，去开创一个独立研究中国的新时代，对于年届而立之年的他，这就足够了，拿外交使团的一个位子交换是值得的，至于别人怎么说，那就让别人说去罢。李希霍芬选择由南亚进入中国的路线，绕道印度，穿越丛密的热带雨林，从南路迂回进入中国。在直布罗陀海峡通航之前，这是由德国南抵中国的唯一海上通道，这条航道的创始者拿自己航海公司的名字命名为“奥斯坦汀航线”。1716年奥斯坦汀航海公司的两条商船，飘扬双头鹫图案的德国旗，到达印度马德拉斯的马拉巴尔海岸，使当年有“帆船王国”之称的荷兰和跨海经商的英法商人大吃一惊。1828年，德国商船“曼陀”号进泊当时中国唯一的开放港口——广州。有趣的是，双头鹫图案的德国旗曾令广州商人们大惑不解，不久，这“有违常理”的怪诞图案又被一只铁鹰所代替——一段新的通航史开始了。当李希霍芬在他苦心编织的东方之梦里驰骋想象的时候，这些与丝绸有关的故事几乎变成了伸手可及的鲜活现实……然而，恰在这时，他的中国之行遭遇了经费障碍！汉堡的一位银行家，原先答应为他出资，但当李希霍芬一切准备就绪时却突然背弃了诺言。银行家说，现在的情形，和李希霍芬没退出普鲁士使团之前大不相同，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股东们去信任一个漠视普鲁士国家利益的人。这等于告诉他，汉堡的援助之门在他身后关闭了。

意外的打击令李希霍芬沮丧至极。不久，他打点行囊赴加利福尼亚考察美国西部采矿业。在那里，第二个考察中国的路线，再一次在心中萌动。第二个考察路线，和第一个相反，他选择了北线，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经堪察加半岛抵西伯利亚，从北亚绵长的边境线进入中国。感觉中，他设计的北线，从空中划过一道漂

亮的弧线，拖着惆怅和无奈飘逝在狂虐的西伯利亚风雪中——没有人愿意陪伴他穿越西伯利亚的沼泽地和无垠的蒙古大沙漠，甚至他的朋友——俄国地质探险家彼得·谢苗诺夫都反对他尝试做一次“无谓的自杀”。退一步说，即便有向导，有同行者陪伴，沙皇的巡逻兵也轻易不会放过一个异国人经由他们的国土踏入国土之外的另一块“领地”——中国。《中俄璦琿条约》以后，“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刚刚并入沙俄版图^①，正在扩疆掠地的沙皇士兵会以各种委婉的借口阻止一名德国地理学家进入他们的“东亚势力圈”，不管这个异国人去那里做什么。

李希霍芬梦中的“北线”终于未能“出境”。被连连挫败的李希霍芬真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了。亚历山大·封·洪堡、卡尔·里特尔，作为亚洲研究的奠基者，头戴事业的光环远去了；古斯塔夫·罗泽，以及稍后的彼得·谢苗诺夫和美国地质学家P·惠特尼，在国家机构的官方资助下相继进入更大规模的研究空间，令人望尘莫及，而李希霍芬却在为实施考察计划的方法和途径“上下而求索”。尽管和站在古烽火台上伤今悼古的东方士大夫们有着迥乎不同的遭遇和情怀，但他确有些“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也许他和加利福尼亚真有某种不解之缘。两度受挫以后，这里的海风、海浪拍击着他枯涸的胸怀，第三次中国之旅的欲望不久又在他的心中萌动，眼前时而闪过梦幻的线条。当时的加利福尼亚正置于史诗般的西部传奇时代，冲浪般的西部淘金热，濯去

^① 1858年签订的《中俄璦琿条约》规定，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荒凉、贫瘠的覆盖，用财富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绚丽夺目的黄金梦，次第崛起的资本高地仿佛一夜之间用神奇的油彩喷上去的。西部的版图，凸现出一个诱人的字眼：机会。

西部是过路人“一脚踢出来的”。人们习惯用一种诙谐、传奇的口吻追溯西部某座城市的历史源头。这些故事大多与淘金有关。加利福尼亚的采矿业十分发达，从深邃绵长的加利福尼亚谷地到丘壑纵横的加利福尼亚半岛腹地，星罗棋布的矿点汇聚成一条巨大的黄金流，沿趋缓的山势冉冉而下。李希霍芬没有想到，他对于加利福尼亚采矿业的考察研究，能在异国的讲坛上“投石激浪”，获得极大成功。当演讲结束时，甚至有人从听众席上站起来，喊他“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在一旁为他主持演讲会的美国同行 P·惠特尼教授指着台下说：

“前排那些为你鼓掌的人里面，有不少投资采矿业的银行家——祝贺你，我的同行，你的机会来了。”

惠特尼的话让他眼前一亮。他感动地拥抱惠特尼，动情地说：

“但愿这掌声为我的下一个成功响起……”

“能告诉我，你的下一个目标么？”

李希霍芬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这是可望得到最有影响力的科学与实践成果的地方。哥伦布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对我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片新大陆。”

获得银行的资助，获得影响其地理考察生涯的重大启示，对于成就李希霍芬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加利福尼亚作为他第三次中国之行的起点，那么这是在 1868 年。这一年，所谓“开辟独立研究中国的新时代”树起一块里程碑，碑铭上写着李希霍芬的名字，这个名字在 30 年后，对青岛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让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大放眼光的，不是“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的才干，而是他们远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重返哥伦布时代”和“寻找新大陆”的奢望，像梦幻中的巴格达飞毯，托起银行家和科学家的东方之梦。为此，李希霍芬在接受银行家资助之后，签下一个合同，答应把考察报告定期提供给驻上海的欧美商会，他在选择考察地点及研究方向时，必须考虑欧美商会的利益。这纸依据所谓“公平交易”原则签订的合同，差不多是“以销定产”，没保留多少个人的自由空间，但李希霍芬却未置一辞。吴淞口外，繁繁点点的沪上灯火从迷蒙的江面上消逝以后，强劲的江风披襟而来，他思考着如何让双脚走得和不羁的思绪一样远……

从 1868 年开始，李希霍芬从上海开始他独自亲历中国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当时 18 个行省中的 13 个，考察了欧洲人几乎从未涉足、更谈不上进行过科学考察的广大中国腹地，不用说在当时，即使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他也是在中国版图上走得最远的外国人之一。他的足迹，溯运河北上，历江浙、经齐鲁、抵京津、赴满蒙、出陇海，纵横大半个中国，北抵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土高原，首次创造性地阐释了这块承载炎黄地脉的厚土对于中国自然形态的意义及其形成机理，揭示了欧洲人称之为“黄旗之国”的文化象征和博大内蕴。

架破旧的骡马车在飞扬的黄尘中辘辘而行，挂挑帘的轿车驮着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吱吱呻唤，落日渐渐沉入幢幢山影，远处的村落炊烟袅袅，眼前掠过一道鞭影，车夫的吆喝声在空气中欢快地抖动——这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他弓身蜷坐在轿车里，就着挑帘透进的余光，仔细勾勒远山的轮廓，或者为自己的考察生活即兴写生……这些从他笔下诞生的速写，记录着他在中国亲历的一幕幕场景，收录在他去世后发表的中国旅行日记里，为我

们真实地描摹李希霍芬的中国之旅节省了大量笔墨。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当之无愧地站在 19 世纪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封·洪堡和卡尔·里特尔的继承人之列的李希霍芬，当年闯荡中国 13 个省时，主要靠两张地图作向导。一张是从欧洲新兴地理学的角度绘制的（作者海因里希·贝格豪斯，曾经是洪堡的制图员）；一张是从中国传统的理论制图的角度绘制的《武昌地图》，虽然它无法表达一张现代地图所应包含的准确信息，但已属当时内容最详尽的中国地图（1863 年应张之洞的要求而出版）。对比之下，李希霍芬发现，地图上标示的许多山脉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按照中国传统的写意方法摹拟现实的理论制图，无法表现海拔高度，必须根据自己亲自测出的大量高度数据重新标注。可以说，李希霍芬是在“并不熟悉路径的跛足向导”的陪伴下游历大半个中国。

1871 年，李希霍芬寄回欧洲的第一份考察报告，给奥古斯特·彼得曼出版的杂志《地理学报告》带来一个火爆的夏季，使这份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名声大噪。这不能不归功于彼得曼主编的一双慧眼。当他收到这份沉甸甸的邮件时，发现寄件人正是他苦苦守望的李希霍芬，这个消息在遥远国度的名字一下子冒出来，本身就预示着一种奇迹。特别是当他从邮件中发现那张小比例的简明中国地图时，他的双瞳立刻触电了。那上面不仅标出了李希霍芬的考察路线，还用纤细的笔划注出了矿山的位置——彼得曼立刻掂出了这份考察报告的分量，以最快的速度刊发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从此，李希霍芬的名字不胫而走。

为了摆平和上海欧美商会的关系，在媒体发布之前，他曾将报告寄往上海。商会汇编成《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并复制成多份，但商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有关情报的机密性，所以只有寥寥几份寄达欧洲。尽管李希霍芬和商会之间有一份“以销

定产”的合同，但通过彼得曼首次公布他的考察成果，并不认为有所谓“移情别恋”之嫌，相反，他坚持认为，趋动经济利益与科学成果的有益结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之一。人们蓦然发现，从他的论文在《地理学报告》上捷足先登，学术上与政治上的李希霍芬已经磨砺成一柄寒光四射的双刃剑了。

六年之后，李希霍芬回过头来，开始检阅他行囊中的瑰宝，显得那样从容不迫，坦荡而自信：1877年，李希霍芬出版了五卷本的巨著《中国，独自旅行基于其研究的成果》（简称《中国》）第1卷，向西方社会展示了一幅中国风貌与文化空间的巨幅画卷，由此成为波恩、莱比锡和柏林大学的有名望教授和扛鼎19世纪中国研究第二阶段的巨人。1885年，李希霍芬出版了《中国地图册》，这部由54张比例为1:750000的地图组成的鸿篇巨制，是一整套解读中国的特殊语言符号，包括许多世所罕见的新面孔：第一份中国地图、第一份中国地形图、第一份中国地质图……无怪乎西方世界惊呼“直观的中国从这里敞开大门”。在这次空前的直观描述中，青岛第一次进入西方社会的视野。它的名字出现在《山东东部（胶东）地图》上，当时标注在青岛方位上的只有崂山和浮山所。由于远距离描述的结果，图中标注青岛口的位置上出现了较大偏差。经考证，这张地图（现保存于青岛市档案馆），是李希霍芬与理查德·凯普于1876年共同完成的作品，图中的山脉由李氏绘制。因为李希霍芬本人并未实地考察胶州湾，所以这张地图上的青岛给予世人的印象是朦胧而遥远的。尽管如此，青岛在西方文献中的初绽一笑，依然对若干年后德国海军选择东亚锚地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作为中间人，P·惠特尼曾多次提醒李希霍芬注意与上海欧美商会的关系，不能走得离合同太远。据商会的人讲，李希霍芬

进入山东以后，马不停蹄地四处寻找煤矿，足迹遍及博山、章丘、潍县和沂州府（后来这些地区都划入德国人的采矿界内），表面上看，这和商会委托他的“全面探查这个封建帝国的矿位”并行不悖，但他对山东的过分关注，又使人怀疑他似乎在为帝国海军选择一处加煤站，这样干下去将有违商会的重托。李希霍芬则一再抱怨商会故意封锁他与欧洲的联系，这对于一个眷恋祖国的人来讲，不仅从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使他在中国的考察活动变得毫无意义。到了 1882 年李希霍芬的《中国》第 2 卷出版，这种认识上的濠沟，再也无需掩饰下去了，欧美商会终于发现，他们花费大把英镑、美元放飞的“风筝”再也拽不住了，它正一步一步地接近帝国海军未来的东亚锚地……

这只“风筝”的飞行方向，一开始并没引起柏林太多的关注。1869 年 3 月至 5 月，李希霍芬曾用 3 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山东半岛。山东的富庶使他惊叹不已，胶州湾的发现，又成为这盘未来棋局中的“命门”，投一子而全盘皆活——他开始为掷下第一枚棋子布局谋篇了。在李希霍芬眼里，半岛以西的广大腹地，宛如一条飘逸的黑绸带，上面缀满了乌黑闪亮的煤和铁。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空气里混合着一股硫磺味儿，驾车的骡子不习惯地侧头打着一连串响鼻，在登陆中国不久的李希霍芬看来，浓烟冲霄的博山城“是我迄今看到的工业最发达的一座城市。所有的人都在劳动，都有活干。这个城市有着众口皆碑的工业城镇的声誉。这里的优质煤蕴藏在景色美丽的地方，这些煤很早就用于各个工厂，而这些工厂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这位风尘仆仆的异国人还十分称道这里特产的鼻烟壶，和各色瓷瓶上那些令人惊叹的纹饰图案，试图通过这些令西

方人赏心悦目的物件儿，为博山城的煤山配上和谐的背景音乐。在《中国》第 2 卷里，李希霍芬用了整整 3 页来描述他在博山的观感，这些描述固然过于乐观，但当博山和坊子煤矿在 1898 年通过一纸租借条约统统归入德国人的采矿界内之后，人们才不得不对这些近乎煽情的表述刮目相看了。

接下来，是一条虚拟的山东铁路和一座未来自由港的诞生。步履匆匆的李希霍芬错过了考察胶州湾的机会，却凭借理论数据在《山东东部（胶东）地图》上特别标出了青岛（这样的理论制图在李希霍芬是不多见的），并且把它和半岛东北端的芝罘作了一番比较研究。也许为了弥补他与冥想中的北方大港失之交臂的缺憾；也许对芝罘的比较研究使他灵犀顿开，神思飞动；也许他特意要为山东之行设计一个点睛之笔……总之，当青岛在这张地图上一俟落定，便注定要告诉世人许多未知的和可以预见的事情，眼下，它把所有潜台词藏在身后。

面对芝罘——当时山东唯一的开放港口，李希霍芬似乎有一种桎梏的感觉，排阔的海浪小山般地从堤边掠过，回卷到海里，又丘壑似地起伏着，他感到视线被绵延的丘陵山地切断了，看不到半岛西南的广大腹地和那条蕴藏富集的黑色矿带，环绕芝罘的山脉切断了港口和山东内陆的联系，于是一条铁路的幻影从脑海中浮现，像巨大的吸管通向吞吐风云的腹腔——胶州湾。李希霍芬这样论述他的构想：

“从这儿（青岛）修建一条廉价的通向人口稠密的生产地区的铁路。这样，企业就能保证得到充足而又价廉的燃料供应。同时，还可以在港口开发蒸汽机动力生产，并由此发展各种工业。如此，北方的棉花、钢铁和其它产品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几个重要地区，北方的进口也会更加便宜。拥有大量煤田的山东，取决于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各种相互联

系网的建立。因此，我们投在芝罘的大部分资金会因此丧失。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未来，就会发现，在胶州设立事务机构的利益是如此之大，相比之下在芝罘的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与内地连接的交通线的开辟，是山东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前途所在，即使中国在物质上、科学文化上和工业生产上的崛起直接违背欧洲先进工业国的利益，但这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鉴于这种情况，外国列强必须保证自己在这一即将到来之大发展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对于“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李希霍芬言之凿凿：选择青岛作为“华北最大和最好的港口”，把它与济南府的联系作为与整个华北联系的起点，“它（青岛）更应是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

李希霍芬曾多次通过送达柏林的备忘录，向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陈述上述建议，然而一贯奉行“大陆政策”的俾斯麦却未置可否。据前胶澳租借区全权代表施拉迈尔事后的分析：“根据李希霍芬的报告，俾斯麦当时应该有占领胶州湾这一打算。”其实，并非俾斯麦这种“自我克制的老普鲁士人”的悟性所不及，他曾命令德国驻北京公使莱福尤兹以北德意志联邦的名义与清政府谈判，但这位公使并未执行帝国宰相的命令。1890年，俾斯麦倒阁，即位不久的威廉二世开始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演变的新进程。这时，李希霍芬的备忘录才重新浮出水面，为激发德国对远东的军事野心并进而攫取胶州湾作为殖民地的扩张政策作了重要提示。实际上，在帝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漫长的“选址”拉锯过程中，李希霍芬一直被奉为诠释中国的辞典和地图，“指向远东的臂膀和手杖”。他对选择青岛作为“军事基地和商港”的双重定位，被海军上将梯尔匹茨誉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声噪一时的李希霍芬赞歌，在克虏伯大炮的无情黑瞳下，最终酿致 1897 年初冬的“胶州湾事件”，黑鹰的利爪从风云突变的黄海之滨攫取了这颗“未经雕琢的宝石”——青岛。自此，凭着两张地图深入大半个中国的李希霍芬，在耗去大半人生之后，其地理考察活动伴随青岛并入德国海外殖民地的版图而终有定论。

不久，在华德商在上海的喉舌《东亚劳埃德报》刊出胶州专版，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中有关胶州的内容被全文登载，题名叫《胶州赞歌》。

军港之梦：从设防之争的岁月蹉跎中流逝

黄昏，慈禧太后寝前问政——两道折子引起的北洋海军“选址之争”——西太后的最后一句话，给了“选址之争”一个了断——琅威理起草的布置胶澳说帖，给李中堂一个大大的意外——海军衙门名下的白银滔滔而失——北洋海军首次检阅大典后，李鸿章视察胶州湾——姗姗来迟的设防，注定将成为一个悲剧的开始——章高元移防胶州湾——炮台的远影在崎岖的岸线上缓缓爬行——海靖“指索胶州湾”，表明日耳曼人已经完成了一个思考

黄昏，给整座皇城蒙上了一层锈色，御花园里的花草也不像在太阳底下那么风情万种，倒有几分“花向黄昏无人怜”了。用过晚膳，西太后慈禧照例在御花园里以步代辇散散心，然后召集几个近臣问话，这不成规矩的规矩，隔三岔五总有那么一回，在光绪皇帝亲政之前，寝前问政，自有它的妙用，大凡不宜于朝堂公议的事情，大都拿到这儿做个了断，或生杀予夺，或决策应对，或驱谴调度，或面授机宜，都在这里一锤定音。每当西太后问话的时候，平时在太后、皇上面前行走的一干人等及几位重臣常常侍立左右，须臾不可离之，自然，身居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李鸿章大都在场。

李鸿章，道光年进士，清末淮军臬将，洋务派的实权人物。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筹办北洋三省海防，创办近代海军，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后，慈禧太后命其“专司其事”，执掌海军大权。